

中國版本

赵
前
著



文化叢書

插图珍藏本

明
本

主
编
任
继
愈

江
苏
古
籍
出
版
社

G256.22
Z315

赵
前
著

中國版本文化叢書
主編 任继愈

明
本



江
苏
古
籍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本/赵前著.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3. 8

(中国版本文化丛书/任继愈主编)

ISBN 7-80643-786-X

I. 明... II. 赵... III. 明刻本 IV. G256.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9769 号

- 书 名 明 本
著 者 赵 前
责任编辑 吴 迪
出版发行 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扬中市金星路 78 号 邮编 212200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8
印 张 10
印 数 1—6000 册
字 数 178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43-786-X/K·230
定 价 22.00 元
(江苏古籍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总序

黄永年

这套《中国版本文化丛书》所讲的版本,是书的版本,是中国书籍的版本,而且主要是讲现代书籍之前通称为古籍的版本。这好像只是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学问,其实并不尽然,凡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史、经常接触使用古籍的人,都得多少有点这方面的知识,事实上也有很多学人懂得了这方面的知识而且成为古籍版本专家或爱好者。范围再扩大一些,有许多并非从事研究或教学而从事其他行业的人,也会对古籍版本发生兴趣。请看中国书店等拍卖旧本古籍时场面是何等热烈,今年我先后在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作这方面的讲演,听者也座无虚席,所有都说明这项学问确已得到社会上的认可和欢迎。

社会上认可并欢迎这项学问,但出版界提供的读物却不怎么多。现代人在这方面的著作只有几种教材性质的东西,不仅多数简单得有似提纲,且平铺直叙,实在谈不上有什么可读性。很惭愧,我在这方面也写过两种,一简一详,可详也不到二十万字,只能在版本演进的历史和各个地域各个时期的特色上做到科学的讲述,要生动活泼,使非专家也爱读,颇感无能为力。再看近年来以“收藏”为名的刊物已层出迭见,多数只讲陶瓷、古钱、玉雕、漆器之类,很少涉及版本。我认为,江苏古籍出版社如今出版的这套《中国版本文化丛书》,很有创意,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缺,并且把版本这门学问从学者的书斋和图书馆的善本部中解放出来,直接面对广大读者。

这套丛书分宋本、元本、明本、清刻本、少数民族古籍版本、坊刻本、家刻本、活字本、插图本、新文学版本等等多种专册来撰写,力求反映出我国版本研究的最新风貌和水平。当然,有人怕这样体例会欠统一,还会出现重复,我认为不必担心。体例是大体上做到统一的,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像教科书那么章节井然。我回忆当年步入古籍版本领域时看了些什么书,有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有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有孙毓修的《中国雕版源流考》,有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还有各家的书目和题跋,真可说是五花八门,哪拘于一个体例,一个框框,可就是把版本之学学到了手。一套丛书十几种,内容有时出现点重复也不要紧,如有说毛晋汲古阁是家刻,也有说应属坊刻,各人写各人的,角度不同,见解也不尽一样,来点百花齐放,岂不比一花独开更有意思。

过去我看的讲版本的书,都有个缺点,即只有文字,有些东西说了半天不一定说得明白,要看原书才清楚。原书不易看到,可以看它的图像,这过去习惯叫书影,即用豹窥一斑的办法,把该书选择一页刻印或影印出来,现在通称之为图录。这种书影、图录过去出过几种,建国后还出了一部大型的《中国版刻图录》,由前辈版本专家赵万里先生主持其事并写了解说,只是写得较简略,明清部分也选得太少,不能让人们看到现存明清本的整体面貌。今天好了,这套丛书分专册编写,每册本身就附以大量的图像。而且以往的书影、图录好的用珂罗版印,差的用胶版以至石印,都只有黑白两色,连收藏印记都无从套红。这套丛书则改用彩色印制,让读者如同见到原书。这样一册在手,图文并茂,使艰深的专业知识化解开来,明白易读,好似看图识字和看连环画小人书那样,自可大大增加阅读的兴趣。

中国是雕版印刷以至活字印刷的诞生地,包括印刷术在内的四大发明是中华民族在人类文化史上写下的光辉灿烂的篇章。老一辈的专家已在版本这门学问上作出了让我们仰慕的业绩,今天有志于此道者更应努力,使之后继有人,而且后来居上,这是我这个年近八十的老人的心愿。我相信,这套丛书的问世,将使我这个心愿的实现得到有力的保证而决不使之落空。

目 录

上编 明本春秋

明本发展的社会背景及主要原因	3
一、安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使经济迅速发展	3
二、重教兴学,培养选拔人才;举贤招隐,重用贤能之士	4
三、注意采集图书,重视教化作用;诏除书籍税收,刺激刻书 事业	5
四、宽松的出版政策,为书籍出版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5
五、发达的经济,刺激图书的消费	6
六、制书材料的进步,为刻书业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7
七、廉价劳动力,降低了刻书成本	9
明朝政府的刻书机构及其刻书情况	10
一、内府刻书	10
二、中央政府刻书	16
三、地方政府刻书	20
明代藩府刻书概说	23
一、研究明代藩府刻书,首先应界定其内涵和外延	24
二、研究明代藩府刻书,必须重视其地域性的特点	25
三、研究明代藩府刻书,必须注意其时代性	27
四、明藩府刻书的地位和价值	28
明代私人刻书简述	30
明代坊肆刻书概况	35
一、明代金陵坊肆刻书	35
二、明代建阳坊肆刻书	38
三、明代杭州坊肆刻书	40
四、明代其他地区的坊肆刻书	41

活字印本述略	44
一、金属活字印书	45
二、木活字印书	47
明代的版画	49
一、洪武至隆庆时期	49
二、万历至崇祯时期	55
明代的套版印刷技术	69
明代刻书的版式特点	73
一、明初至正德时期的版刻特点	73
二、嘉靖至万历时期的版刻特点	74
三、万历后期至崇祯时期的版刻特点	75
明代刻本鉴定要点	76
明代的抄本、彩绘本	78
一、明代内府的抄本、彩绘本	78
二、明人盛行抄书之风	79
三、明代抄本鉴定	89
明代书籍的装帧形式	90

下编 明本撷英

内府刻本《元史》	95
状元书法家吴宽手书的《山海经》	98
涂祯刻本《盐铁论》	101
《史记》的“嘉靖三刻”	103
袁褰嘉趣堂刻本《六家文选》	110
明代最大的一部雕版画册《赐号太和先生相赞》	113
项笃寿嘉靖刻本《今言》	117
明内府抄本《永乐大典》	120
张鼎思刻本《本草纲目》	126
毛氏汲古阁的刻书与藏书	129
从《十竹斋书画谱》看木版水印	133
小宛堂仿宋刻本《玉台新咏》	138
宋应星与《天工开物》	143
从凌濛初刻四色套印本《世说新语》说开去	147

范氏天一阁的刻书与藏书	151
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的发现与入藏	156
祁氏澹生堂抄本《萨天锡诗集》与祁承燾的《澹生堂藏书约》	160

参考文献	164
-------------------	-----

图版索引	167
-------------------	-----

后记	170
-----------------	-----

上 编

明 本 春 秋

“明本”一词，具有很宽泛的含义。它不仅包括明代雕版印刷、套版印刷的书籍，也涵盖了用活字摆印的书籍以及抄写、彩绘的书籍。明代是中国古代印刷史上的辉煌时期，刻书的数量之多、地域之广、技术之高、影响之大，是以往各代无法相比的。据有关资料统计，明代刻书数量多达 35 000 种；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府到书坊几乎都在刻书，刻

书地域遍布全国，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刻书尤多。这个时期，活字印刷、套版印刷日渐风行，“短版”、“拱花”的发明和应用把雕版印刷的技术水平推向巅峰。文学、艺术、医学、科技诸方面的名篇巨著，不仅影响着当时也影响着未来，不仅影响着中国也影响着世界。明代不仅刻书风靡全国，文人抄书也盛行于世。本书仅对明本情况进行简要概述。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五

七

齋
齋名十一

遇齋

宋趙蕃淳熙崇周愚卿用荀卿氏之語以遇名齋從余求詩為賦古意一首世俗爭知競治容紛紛墮充交相從誰知亦有

東正色奉養辛勤供織春過期不嫁心不悔慳蹇數夫終德配君不見蘭生林下久含章得時可以充君佩

存齋

臨川志金谿縣

象山槐堂書院有堂扁存齋宋朱晦庵大全集存齋記予吏於同安而游於其學嘗私以所聞語其士之與予遊者於是得許生升之為人而敬愛之比予之辭吏也請與俱歸以共卒其講業焉一日生請於予曰升之來也吾親與一二昆弟相為築環堵之室於敝廬之左將歸爾達菴而居焉惟夫子為知升之志敢請所以名之者而幸教之則升之願也予辭謝不獲因念與生相從於今六七年視其學專用心於內而世之所有一豪不以介於其間嘗竊以為生之學蓋有意乎孟氏所謂存其心者於是以存名其齋而告之曰予不敏何足以知吾子然今也以是名子之齋則於

明本发展的社会背景及主要原因

一、安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使经济迅速发展

1368年,朱元璋经过多年的征战,终于力挫群雄,登上了皇帝宝座,定都金陵(今南京),建立大明帝国,是年改为洪武元年,朱元璋为明太祖。由于元朝统治者和蒙、汉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与摧残,元末农民的生活是极其痛苦的;元末各地的连年战乱,更使得社会秩序极混乱;而沉重的租税与徭役,又造成农民大量逃亡,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民不聊生。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以后,面临着安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等诸多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对新兴的明王朝执政者是严峻的考验。朱元璋首先采取了与民休息的办法。他认为:

“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殖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洪武实录》)根据朱元璋的这个指导思想,明王朝先后采取了蠲免税粮、兴修水利、奖励垦荒等一系列措施。到洪武末年,整个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改观。另外,朱元璋还加强了民政、地政的整顿和管理。民政方面,先后推行户帖制度、黄册制度;地政方面,派人到各地主持监督丈量土地,实行鱼鳞图册制度。这些制度的实施,不仅打击了豪强地主,而且对平均赋税徭役,减轻农民负担,安定社会秩序,解放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生产,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明朝政府对手工业者也实行了新的政策,下令改变工匠的服役制度。规定不为官府服役的工匠,缴纳顶工银即可。工匠在服役以外

的时间,可以自己从事生产,产品可以在市场上自由出售。这些政策,激发了工匠的生产积极性,手工业也逐渐发展起来。

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与发展,不但构成了明朝政权巩固的社会经济基础,同时也是其他一切事业,如文化、教育、科学以及刻书出版等事业发展的前提。其中特别是工匠政策的调整,则直接关系到包括刻书工匠在内的切身利益。

二、重教兴学,培养选拔人才;举贤招隐,重用贤能之士

朱元璋虽然家境贫寒,又出身行伍,仅粗通文墨,但他对文化却有较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武定祸乱,文致太平”(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因此,还在他争打天下的时候,“即开学校,延师儒,俾勋贤之子弟,凡民之俊秀,莫不从学”(黄佐《南雍志》卷二三)。待他登上皇帝宝座以后,更加重视文治的作用。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尝谕国子生,称“古之学者,文足以经邦,武足以戡乱,故能出将入相,安定社稷”(黄佐《南雍志》卷一),透露出他的教育方针是要培养文武双全的人才。同年,朱元璋还诏谕中书省,称“朕恒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今京师虽有太学,

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黄佐《南雍志》卷一)。自此,全国各府州县皆先后设立儒学。朱元璋还特别关心北方的教育,称“近北方丧乱之余,人鲜知学,欲求多闻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学诸生中年长学优者,卿宜选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之务学,贤才可兴”(黄佐《南雍志》卷一)。洪武八年(1375),又“命丞相往国子学,考校老成端正、学博经通者,分校天下。令郡县广其生徒而立学焉”(黄佐《南雍志》卷一)。朱元璋这样的认识,极大地影响了以后的皇帝,使明代的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永乐十八年(1420),南京的国子监有学生9000余人,这在以前历代是少有的(柳诒徵《五百年前南京之国立太学》)。各地的郡学、县学也普遍建立,“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明史》卷六九)。明朝沿袭了唐宋的科举制度,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社会上形成了广泛的读书风气。朱元璋还特别重视举贤招隐,称“自古圣帝明王,建邦设都,必得贤士大夫相与周旋,以成至治。今土宇日广,文武并用。卓犖奇伟之士,世岂无之?或隐于山林,或藏于士伍,非在上者开导引拔之,则在下者无以自见。自今有能上书陈言,敷宣治道,武略出众者,参军及都督府俱以名闻。若其人虽不能文章,而识见可取,许谒阙面陈其事,吾将试之”(余继登:

《典故纪闻》卷一)。同时还营造礼贤馆于应天,给招聘来的贤能之士以优厚的待遇。一时“陶安、夏翊、刘基、章溢、宋濂、苏伯衡等,皆在馆中”(鄂尔泰、张廷玉《明纲目前纪》卷上)。朱元璋这一系列重教育、拔人才、聘贤士的政策,对于促进明代社会的文化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也为刻书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三、注意采集图书,重视教化作用;诏除书籍税收,刺激刻书事业

对图书及其教化作用的重视,是明太祖一贯的思想,是其大政方针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明立国之前,朱元璋就对图书事业显现出了极大兴趣。据明朱国桢《皇明大政记》卷一载: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发兵攻灭陈友谅,即下令访求遗书。明王世贞《命将征讨考》则云“徐达入北京,封其库府图书宝物”,明朝初立,又“命有司博求古今书籍”(龙文彬《明会要》卷二六)。由此可见,朱元璋对图书典籍很重视。这无疑对明代书业的发展、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明代刻书事业之所以蓬勃发展,是与朱元璋对刻书实行了特殊政策分不开的。明王朝立国之初,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有利于书业发

展的举措。据《明史·本纪第二·太祖二》载:“洪武元年八月,除书籍、田器税。”可见在明太祖心目中,作为文化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书业,与恢复农业生产,解决民生问题是处于同等地位的。明代这一政策的推行,对刻书事业无疑是个极大的刺激和解放。这与元朝统治时期有天壤之别。蒙古统治者在未过江之前,施行“三十税一”的政策,也就是说,如果出售三十册书籍,其中一册书籍的书款,作为税收上缴。渡江以后,税收变本加厉,由原有的“三十税一”改成“二十税一”,不仅使出版者怨声载道,也影响了书籍的印刷与传播。明代上自朝廷内府、诸王藩府、各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府、州、县及其儒学,都以刻书为风尚,下至南北两京、福建、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区,则书铺如林,书溢市肆。明代刻书事业能够出现如此局面,可见政策的重要性。如今大量流传于世的明代官刻私雕书籍,是其有力见证。

四、宽松的出版政策,为书籍出版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众所周知,元朝对著述和刻书的管理非常严格。关于著述,元代刑法中明文规定“大恶,诸妄撰词曲,……凡以邪说左道,诬民惑众

者,禁之,违者重罪之”(《元史·刑法志》);而刻书要由本路进呈著作,经过逐级批准,才能出版。明代陆容《菽园杂记》云:“尝爱元人刻书,必经中书省看过,下所司,乃许刻印。”清代蔡澄《鸡窗丛话》云:“先辈云:元时人刻书极难,如某地某人有著作,则其地之绅士呈词于学使,学使以为不可刻,则已。如可,学使备文咨部,部议以为可,则刊板行世,不可则止。”这种管理方式主要是出于对知识分子的防范之心。结果使得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书,因为不符合政府的口味,失去了出版的机会,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流传下去的机会。元代人的著作本来就不多,加上这种限制,印本就更少了。明代政府虽然也有书禁,但是明代的图书出版政策,与元代相比还是相当宽松的。明政府对于民间一般的学术和创作活动,干涉也不多。所以,明代著述急剧增加,丛书、类书的编辑亦十分活跃。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明人著作达 15 725 种,其原因除明代立国时间较长外,与元代书禁森严有直接的关系。在明代无论官府、私宅、坊肆,或达官显宦、读书士子、太监佣役,只要财力所及,皆可刻书。以至于“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身衣饱暖,歿时必有一篇墓志。此等板籍幸不久即灭,假使尽存,则虽以大地为架

子,亦贮不下矣”!多则以滥,不能不说是一个弊病,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代刻书之盛。明人刻书,据统计不下 35 000 种,其中明人著述超过半数。

五、发达的经济,刺激 图书的消费

明王朝建立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轻徭薄赋的政策,社会相对稳定,至洪武十八年(1385),粮食产量已是元时的两倍。永乐时经济发展更快,“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羨,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担外,府县仓廩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明史》卷七十八)。尤其是江浙地区,比其他地区更为繁荣,张瀚《松窗梦语》卷四曾有这样的描述:“沿大江而下为金陵,……五方辐辏,万国灌输,三服之官,内给尚方,衣履天下,南北商贾争赴。自金陵而下,控故吴之墟,东引松、常,中为姑苏,其民利鱼稻之饶,极人工之巧,服饰器具,足以炫人心目,而志于奢侈者,争趋效之。……嘉禾边海,东有鱼盐之饶;吴兴边湖,西有五湖之利。杭州其都会也。……米资于北,薪资于南,其地实膏而文侈。然而桑麻遍野,茧丝绵苎之所出,四方咸取给焉。”

明中叶以后,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手工业

者和市民阶层的扩大,都对刻书出版业有很大的影响。首先,城镇居民迅速增加,他们生活相对稳定。当他们物质生活得到一定的满足之后,立即对文化精神生活提出相应的或更高的要求,于是戏曲、小说等平民文化作品便大量产生并版行于世了。“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著。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蓄而有之。痴呆女妇,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为《女通鉴》有以也。甚则晋王休征、宋吕文穆、王龟龄诸名贤,至百态诬饰,作为戏剧,以为佐酒乐客之具。有官者不以禁杜,士大夫不以为非,或者以警世之为而忍为披波助澜者,亦有之矣。意者其亦出于轻薄子一时好恶之为,如《西厢记》、《碧云骖》之类,流传之久,遂以泛滥而莫之救欤!”(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此段描述,正是明代社会戏曲、小说普遍流行的真实写照。这也说明,明代的小说、戏曲在宋元两代的基础上又有发展,因为它们通俗易懂,写的是人民大众的生活,又带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性,深受人民大众尤其是城市中的市民阶层喜爱。一些封建文人不仅不以为非,而且还参与创作。因此,明代的戏曲、小说,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版印行,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明代的官府藏书、私人藏

书规模大大超过前代,有力地刺激刻书业的发展。明代中央政府藏书十分丰富,杨士奇编的《文渊阁书目》著录的7294种;编纂《永乐大典》时所抄录的图书,估计有8000种之多。据范凤书先生著《中国私家藏书史》统计,明代有897位藏书家,其中藏书数量在10000卷以上的有200多人,如范钦天一阁,藏书最多时达70000多卷;又如祁承燾澹生堂,藏书达9000多种;还有黄居中、黄虞稷父子的千顷堂,藏书达80000余卷;最多的是宜春的张自烈,藏书达300000卷。而且很多是明代人著述。不少明代的私人藏书家致力于刻书事业,如毛晋就不是为藏书而收书,而是获得善本便刊刻,以广流传。毛晋所刻之书,底本好,校雠精,具有较高的质量。当时有“君获奇书好示人,鸡林(朝鲜古国名)巨贾争摹印”(吴伟业《汲古阁歌》)之说。清代学者朱彝尊也说,毛晋“力搜秘册,经史而外,百家九流,下至传奇小说,广为镂版,由是毛氏钞本走天下”(《严孺人墓志铭》)。此外,范钦、袁褰、赵用贤、赵琦美父子等藏书家同样有刻书的善举。

六、制书材料的进步, 为刻书业提供了良好 的物质基础

纸、墨、笔、砚等是刻书业的基

础,与刻书业的发展兴衰有直接的关系。纸、墨、笔、砚等行业的发展,可以满足刻书、抄书的需要,书业的兴盛又带动各行业的进步。明代两者之间就是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中相互促进与发展。明代笔、墨、纸、砚的制作,数量之大、制作之精、品种之丰富,皆超迈前代,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期。

以笔而言,生产规模之大、分布地域之广、新品名笔之多,是明代笔业的特点。湖笔、湘笔、京笔是主要的支柱产品,时人有“南有湖笔,北有京笔”之誉。品种的增多,为书家誊稿、学子习字,提供了更大的选择余地;为明代精美的写刻本流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墨是印刷的主要材料之一。在明代,制墨业有大规模的发展。徽州是明代最著名的产墨地,墨不但产量大,而且质量好。据有关资料记载,这里的制墨作坊有近百家,所产的墨销行全国,甚至出口到国外。制墨名家辈出,流派众多,墨质精良,墨式新奇。徽州制墨最有名的是程君房(大约,字幼博)与方于鲁(瑞生)。他们所制的墨有几百种不同的规格和形制。他们还撰写并刻印了制墨的代表性专著,如程氏刻印有《墨苑》,方氏刻印有《墨谱》。徽州制墨多以黄山松为主要原料,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介绍了松烟制墨的方法。松烟制墨有不同的等

级,书坊印刷,考虑到成本,往往选用价廉的下等墨。私刻本或官刻本,为保证印刷质量,往往选用上等墨。因此不少传世之本,虽然经历数百年,墨色依然莹润亮泽,宛若新印,可见墨质之佳。除徽州的制墨业外,在其他印刷业较集中的地区,也都有一定数量的制墨作坊。明代还出现用蓝靛印刷书籍的现象,这是一种印刷的新材料。成化年间起,在建阳的坊刻本中出现了这种印本。

明代的制砚业,亦颇发达。入明之后,传统的名砚如端砚、澄泥砚等枯木逢春,再入佳境,一些新开发的砚材亦负盛誉,如北京的潭柘紫石砚、东北长白山的松花石砚,四川的嘉陵峡砚等,名色繁多。间接地为明代文化的繁荣,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纸是书籍的载体,明代造纸业又有新的发展,纸张的产量和质量都超过宋、元时期。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是明代纸张的四大产地。江西广信府的永丰、铅山等地,是造纸的集中地,其原料有构皮、竹丝、百结皮等,这里造的纸漂工精细,纸质洁白,工艺精良,是印刷的上等纸张。福建盛产竹子,生产的纸张多以竹子为原料。浙江造纸以瞿溪为中心,多以桑皮为原料生产纸张。安徽的兴国、泾县、徽州以产棉纸而闻名。明代纸张的品种有

一百多种,用于印刷者只有一部分。其中衢州各县的书籍纸,建阳的书籍纸,永丰的棉纸,常山的柬纸、宝钞纸等都是印书的上等纸。胡应麟说:“凡印书,永丰棉纸为上,常山柬纸次之,顺昌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谢肇淛说:“印书纸有太史老连之目,薄而不蛀,然皆竹料也。若印好版书,须用棉料白纸无灰者,福建、浙江都有。楚、蜀、滇中棉纸莹薄,尤宜于收藏。”(《五杂俎》卷一二)总之,明代造纸业的发达,为印刷业提供了足够的原材料。使明代产生的一些鸿篇巨制,得以广泛流传。

另外,纸、墨、笔、砚等行业的发展,不仅满足了刻书业的需要,而且也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尤其满足了文人读书、藏书的需要。明代的官府藏书、私人藏书都非常重视抄书,这是因为当时的许多善本、秘本不易得到,只能抄录副本收藏;其次,一些藏书家经济条件有限,不得不通过抄书来节约开支,增加藏书。总而言之,明人藏书、抄书的习惯,也有利于纸、墨、笔、砚业的发展。

七、廉价劳动力, 降低了刻书成本

明朝中叶,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大批农民倾家荡产,流亡城镇,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城镇和城镇居民迅速发展。这给手工业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刻书业也是如此。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称:“……明嘉靖甲寅,闽沙谢鸾识岭南张泰刻《豫章罗先生文集》,目录后有‘刻板捌拾叁片,上下两帙,壹佰陆拾壹叶,绣梓工费贰拾肆两’木记。以一版两叶平均计算,每叶合工费壹钱伍分有奇,其价廉甚。至崇祯末年,江南刻工尚如此。徐康《前尘梦影录》云‘毛氏广招刻工,以《十三经》、《十七史》为主,其时银串每两不及七百文,三分银刻一百字,则每百字仅二十文矣’。”低廉的刻书工价,不仅降低了刻书成本,也大大提高了刻书业内部的竞争力,从而有力地刺激了刻书业的发展。

上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因素,正是明本发展的主要原因。